

人民日报关注医疗纠纷: 医生为何成高危职业?

称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

13日,人民日报刊发“聚焦·医生执业状况调查(下)”的报道,关注“医患信任脆弱,患者期望值高,暴力事件增多”现象。

医生流汗又流血

今年以来,医患暴力冲突恶性事件频频发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忧虑。9月21日,湖北武汉协和医院发生一起暴力冲突。一名七旬患者因病情复杂,抢救无效死亡,家属因不认同医院的结论,纠集数十人持械冲击医院。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医患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医疗纠纷不断增加,医生执业环境持续恶化。尤其是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医生普遍感到执业中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医生成为一个高危职业。

2010年8月,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文章——《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文章称:“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认为,不让医生流汗再流血,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谴责医院场所的暴力行为,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一名网友写道:“当医生受到暴力侵犯时,整个社会应该和医生站在一起。我不是在偏袒医生,而是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离不开医生,更离不开好医生。”

医患信任太脆弱

信任缺失是转型期中国医患关系的显著特征。医患暴力冲突愈演愈烈,最根本原因是缺乏信任。

中国医科院整形医院副院长吴念告诉记者,几年前,医院曾收治了一名烧伤男孩,由于家长对治疗效果不满意,把医院告上法庭。令人意外的是,家长居然出示了长达70分钟的录音资料。患方从第一次就诊时便开始录音,包括医生的承诺和解释、抢救治疗过程、多方专家咨询等。

“患者随时留取证据,以备诉讼,这是对医生情感的极大伤害。”吴念说。

生老病死,本是人生的自然规律。然而,很多患者家属对生命的期望值过高,要求医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发生死亡或意外,往往迁怒于医生,无理取闹。

医疗环境恶化,医患纠纷频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医疗知识的专业性,医生占据主导地位,患者处于被动地位,患者获取医疗知识主要依靠与医生的交流沟通。

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说,目前,医患沟通是医学教育的“短板”。医生本来有“三件宝”:语言、药物、手术刀。但是,很多医生只会用后两件,不会用第一件。很多人当了一辈子医生,却不会和患者说话。

用制度保护医患双方

中国医院协会自律维权部副主任郑雪倩认为,医患暴力事件不是单纯的医患矛盾,仅靠医患双方努力无法解决,还需要社会力量形成合力。要从根本上杜绝暴力事件的发生,关键在于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良好的医患纠纷处理制度。

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说:“建立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调解机制,让医院从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可以有效改善医生的执业环境。”

据悉,《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规定,发生医疗纠纷后,索赔金额未超过1万元的,可以由医疗机构与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协商解决。索赔金额超过1万元的,医患双方当事人可以向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举措赢得了医患双方的认可,70%以上的医疗纠纷通过人民调解得到妥善处理,“医闹”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快访

张赞宁:加大医疗投入是根本



张赞宁
东南大学卫生法研究所所
所长

现代快报: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内在原因是什么?

张赞宁:我们的一些法学家,对医患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制定的一些相关法律,不符合医学科学的特征。我跟参与制定新的侵权责任法的杨立新教授当面争论过,该法的第七章只用了区区11个条文就把所有的医疗侵权责任包含在内。这是不可能的。我一直主张侵权责任法要专门立法,而且条文总数要超过现有的。

现在,医疗纠纷呈爆炸性增长,在我的意料之中。过去,医疗事故是立案的一个条件,也是赔偿的前提。现在新的侵权责任法就不谈“事故”,只要有过错,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这就大大地扩大了医疗侵权赔偿责任范围。杨立新教授把这个当成一个亮点,认为这样弱势群体索赔就会容易些。然而我认为这里面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将医疗行为看成是一般的民事行为,把医疗侵权当成一般的民事侵权来对待。从一般的民事侵权角度来看,只要有过错就必须赔偿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医疗行为是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我在一篇文章中介绍

过,交通事故好比有人把花瓶打碎了,而医疗事故就好比有人把破碎的花瓶送来让你修复而你却没有完全修复。这两种行为的赔偿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坚持医疗行为必须构成医疗事故才存在赔偿的问题。医疗侵权赔偿责任范围的扩大,激化了医患双方的矛盾。

现代快报:不少人认为,医疗纠纷的多发,和医德医风滑坡有很大关系。问题是,医德医风滑坡不可能是没来由地发生的。

张赞宁:医德医风滑坡,这一点我是一贯承认的。现在的医德医风不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国家对医疗几乎是全额拨款的,医院不需要自己找饭吃。而医疗被推向市场后,拨款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医院要自己找饭吃。我认为,医疗是不能推向市场的。医疗推向市场,造成了医德医风滑坡。现在,医疗技术不值钱,做个手术收个一两千元已经是收得很高了,但是一个器械却动不动几千上万元。医生的劳动没有体现自己的价值,也会造成医德医风的滑坡。

现代快报:对于缓和医患关系,最重要的做法是什么?

张赞宁:要缓和医患关系,最主要的还是加大医疗投入。国家拨款应该大头,收费只能是很小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医患关系就会好很多。如果医疗规则和市场规则一样,那么医院就会成为很可怕的企业。医生绝对不能希望病人越多越好。

快报记者 刘方志

今日视点

给地沟油出路比检测方法更重要

距离9月中旬公安部公布破获跨省地沟油大案已有一个月的时间,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12日透露,目前征集到的5种地沟油检测方法都不管用,有关部门将再向社会公开征集方法。资料显示,从各国情况看,目前地沟油并无特效的检测技术。

(10月13日《新京报》)

假如有一种灵敏、便捷、便宜的检测技术,立马能分辨出哪些油是地沟油,哪些是正规食用油,这当然是好事。但防止地沟油走上餐桌,寻求有效的检测技术只是一个选项,但不是关键路径或是唯一路径。这是因为,一来研发检测技术需要时间,对此,百姓不愿等,也等不起。二是,即便攻克了检测技术难关,

也未必就会成为“一测灵”,个中道理很简单:检测技术有了,地沟油制作工艺与水平也会升级换代,与检测技术“赛跑”,“反制”检测技术。届时,我们对地沟油的泛滥还是会束手无策。

其实地沟油本无原罪,在世界各国都有,区别在于,我国的地沟油“流进”了消费者的嘴里,而很多发达国家的地沟油却实现了废物再利用。

比如,日本通过政府高价收购泔水,将地沟油作为肥皂、涂料、油漆等工业用原料,或是制造生物燃料;美国除了将废弃食用油用作生产生物燃料外,还将其转化为热能和电能;英国将其制作成生物柴油,甚至变成了航空油。10月7日,英国汤普森航空

公司就推出的“地沟油航班”波音757客机从伯明翰机场起飞,首航成功。

很显然,假如地沟油有其合理的“归宿”与用途,就难以走上餐桌害人,研究地沟油检测技术当然徒劳多余。这或是“世界并无特效的检测技术”的根本原因——在其他国家,既然将地沟油送上餐桌无利可图,政府完全控制了地沟油的去向,地沟油检测技术就没有用武之地,谁还会费时费钱地研制它?!

要让地沟油不再危害餐桌,根本的途径无外乎堵疏结合。所谓堵,就是明确监管责任,提高处罚力度。所谓疏,就是政府部门要控制地沟油去向。比如,相关部门通过行政补贴的办

法集中收集地沟油并进行无害处理,或者借鉴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将地沟油当成制作化工、燃料等原料,变废为宝。如此一来,泔水等餐余垃圾卖给政府指定的回收公司比卖给黑心厂家还划算,谁还会把泔水卖给黑心厂家?

地沟油本无原罪,治地沟油变成食用油这种病,完善检测技术不是最重要的手段,与其花大力气研发检测方法,还不如明确政府高价收购的财政投入义务,尽快确立政府出面回收地沟油的方案,让地沟油有其合理的用途和去处。如此一来,黑心厂家断了原料,地沟油自然也就不会再为害餐桌了。

(惠铭生)

异论锋生

所长脱岗10年 局长应该下岗

陕西山阳县房管所所长张惠阳脱岗10年,在外承包工程赚钱,房管所的工作仅靠电话指挥。记者就此采访该县城建局局长徐建设,徐建设一连说出三个“不清楚”,外加一个“不知道”。

(10月13日中广网)

所长长期脱岗不在外赚钱,工资奖金福利却一点不少拿,虽然名义上还有电话指挥工作,但这跟吃空饷已经没有什么区别。所长脱岗10年很雷人,但管他的局长却一连说出三个“不清楚”,就更雷人了。

可笑。徐建设到城建局局长已有3年,如果说上任伊始对所长脱岗的情况“不清楚”,这还情有可原。任职已经3年,对下属房管所所长长期脱岗竟依然“不清楚”,那就滑天下之大稽了——连手下的所长不上班都不知道,那局长还知道什么?

可叹。局长是干什么的?首先是要管好一局之人,让其各司其职。而要管好一局之人,首先是要管好一局之官。房管所是城建局的重要下属机构,局长连所长去向都不清楚,这怎能说得过去?房管所卷闸门紧闭,附近民众都知道房管所已搬走了,徐建设竟说:“搬到啥地方,我不知道,我没去过。”这也太失职了,没去过房管所,怎么配当局长?

可惜。记者提问时,徐建设一连说了三个“不清楚”,但有一点他却很清楚,而且很清楚,即把责任如何推给别人,自己如何金蝉脱壳。要知道,县房管所所长张惠阳脱岗在外办公,即便是在前任张姓局长手里办的手续,但里面的问题,继任局长也得管,不仅是有权查,而且是必须查,不查,就是渎职。

城建局局长一问“三不清楚”,露出十足的官僚像,庸官像。如果局长管到位了,所长脱岗就根本无法得逞。因此,在对脱岗10年的房管所所长问责的时候,必须对涉嫌渎职的城建局局长一并问责。让那些只知道混日子官员们知道,“不知道”并不是你们的护身符。(张永琪)

热点纵论

违规穿越的驴友当然该为救援埋单

9名驴友在四川四姑娘山失踪,当地政府及四姑娘山景区出动数百人次救援,仅景区用于救援的花费就超过10万元。目前9名驴友已自行安全走出大山,但四姑娘山景区户外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曾凡荣认为,驴友应该为自己的违规穿越行为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初步确定是3万元。驴友们的领队许宁对惊动了这么多人表示道歉,并表示愿意接受处罚。但获救者该不该承担部分乃至全部救援费用,还是引发了巨大争议。

(10月13日《成都商报》)

假如9名驴友不是像许宁所说的未经登记便违规穿越,或者他们在出行之前充分考虑到此

举的风险而不冒进,这种至少从客观结果来看是“空耗”的公共资源折损本可以避免。

作为遇险的驴友,他们当然有享受相关救援的公民权利,但另一方面,作为公共救援体系“资助者”的其他纳税人,也可以表达对无谓浪费公共资源的不满。为了公共资源更多地用到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不被滥用,这时就需要规则来框定权利和责任的界限。假如遇险是因为无视规矩或法律,那么遇险者在获得公共救援的同时,当然也该为自己的“不守规矩”而付出代价。否则的话,拼命报假警导致警力资源不够用的人,也就不该为恶作剧承担责任了。

且不说9名在四姑娘山遇险的驴友是否遵从了驴行圈内的常识规律,单从其采用虚报驴友人数(9名驴友登记为6名)和虚报行进方式(名为露营实为穿越)及瞒报行进线路来获得驴行“准入”来看,已经逾越该风景区户外运动的规定很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四姑娘山景区出动大量人员和物力前往营救,花费成本较大,要求被救的驴友承担一部分费用,当然有其合理性。

政府为绝大多数救援行动埋单,但如果求救者违反了相关规定,则自己也要为救援掏腰包,这在户外探险和公共救援体系高度成熟的美国亦是如此。比如,由于每次救援行动都耗资巨

大,美国国家公园对那些因违反公园规定(像擅闯保护区)的落难者的救援,政府不会为救援行动埋单,呼救者本人需要为自己的违规掏腰包。

所以,要求9名驴友为自己违规穿越引发的公共救援埋单,并不过分。目前的问题在于,尽管因违规探险造成的驴友遇险情况越来越多,但相关的法律法规尤其是救援体系中并未对这种“特殊情况”进行干预。完善救援条款,使得求救者的权利责任更为清晰,这对促使探险者更加注重自我保护和风险评估,以及使公共救援更为有效和广泛地发挥作用,都显得愈发紧迫。(王艳春)